鄧小平與對蘇「葬禮外交」

李景賢

人與事

超規格的禮遇

勃列日涅夫的葬禮定於十五日上午九時在紅場上舉行。十四日晚，蘇方安排外國代表團與逝者遺體告別。十八時五十分，黃華特使一行抵達莫斯科市中心的圓柱大廳。十九時，遺體告別儀式開始在此處舉行。社會主義國家的黨政首腦排在致哀隊伍的最前列。蘇方把黃華特使也安排在比較靠前的位置。各國領導人所送的花圈，一排排地擺放在棺槨兩旁，黃華特使獻的大花圈擺在較爲顯著的位置上。

十五日八時二十分，黃華特使及四名陪同人員抵達紅場，被安排站在列寧墓左側觀禮台的水泥台階第一級上。這是繼周恩來總理一九五三年春參加斯大林的葬禮後，我國領導人第二次參加蘇聯最高領導人的葬禮。在黃華特使的後面，一排排地站着社會主義國家和一些亞非國家的黨政首腦，很少有帶陪同人員的。

在列寧墓上面的觀禮台上，蘇共中央新任總書記安德羅波夫以及蘇共中央全體政治局委員、中央書記處書記，還有勃列日涅夫的夫人勃列日涅娃站在左側，蘇軍將領們則一字排開，站在觀禮台右側。

九時葬禮開始。安德羅波夫致悼詞，各界代表先後發表講話。當日天氣很冷，大約在零下二十攝氏度，在每位講話人的面前，飄着一層層非水非冰的薄霧。九時五十分，安放着勃列日涅夫遺體的棺槨，由蘇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和多名士兵，抬到列寧墓左側的墓穴旁，隨後即舉行隆重的下葬禮。

十四時五十五分，安德羅波夫來到克里姆林宮喬治大廳，準備集體會見參加葬禮的外國領導人。他與黃華特使的會見安排得比較靠前。這位新任蘇共中央總書記，緊緊地握着我特使的手表示歡迎。黃華對勃列日涅夫的逝世，再次代表中國領導人表示「深切哀悼」，說這是「蘇聯國家和人民的重大損失」；轉達了中國領導人對他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的祝賀，祝他在新的重要崗位上取得「巨大成就」；表示中方眞誠希望在雙方共同努力下，中蘇關係正常化能得以實現。對於中國黨和政府派特使參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禮，安德羅波夫深表感謝。他還說，相信中蘇兩國的關係一定會好起來的。

黃華特使回到下榻的莫斯科大飯店後，高興地對我們說：「我今天受到了特殊的禮遇，安德羅波夫總書記同我交談了三四分鐘，而他與別國領導人談話的時間都比較短，大多只有一兩分鐘。」過後不久，蘇聯外交部的負責官員特地來到黃華住處，同我方譯員核對中國特使與蘇共中央總書記談話的俄文記錄。蘇方對這次特殊談話之重視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這次到莫斯科參加葬禮的外國代表團多達一百五六十個，黨與國家第一把手、政府首腦級別的高級代表團就有四五十個。黃華時任中共中央委員、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，相對來說，這個級別並不算高，只能算個中檔。但蘇方在禮賓安排方面，每次都把我特使擺在高檔來賓的位置上。這是一種超規格的禮遇，它一方面說明蘇共新領導「讀」懂了鄧小平「葬禮外交」之深意，看重中國的份量，另一方面也表明，蘇方期待中蘇兩大黨、兩大國的關係以此爲契機，能逐步走上正常發展的軌道。

莫斯科之行的「重頭戲」

黃華特使這次莫斯科之行，還肩負着了解蘇共新領導對華政策意向，向蘇聯領導人當面闡明我對蘇方針的重大使命。他除了與安德羅波夫總書記進行交談外，還遵照鄧小平的指示，主動提出要與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、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舉行會見。對此，蘇方給予了正面回應。這是二十年來中蘇兩國外長的首次見面。這是一次不同尋常的會晤，我們當時稱之爲中國特使莫斯科之行的「重頭戲」。

在會見一開始，葛羅米柯就說，他剛從蘇共新任總書記那裡來，「可以負責任地」代表安德羅波夫對中國朋友們說：蘇方主張改善與中國的關係。

兩國外長着重就消除牽制中蘇關係正常化的「障礙」問題，坦率地交換了意見。蘇聯外長說：「中國不必害怕蘇聯，蘇聯絲毫不會威脅中國。」黃華外長聽他這麼一說，立即回敬了一句：「我們不能不擔心自己的安全，但也不至於睡不着覺。」雙方交鋒了好幾個回合，各講各的，互不相讓。

勃列日涅夫逝世後，在兩年四個月時間內，兩位年邁多病的蘇聯最高領導人，也相繼去世。鄧小平又分別派萬里、李鵬兩位副總理參加葬禮，於是，中蘇兩國領導人又得以多次進行接觸。

在新中國外交史上，曾有過一場著名的「乒乓外交」（一九七一年四月），它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。於是，「小球轉動了大球」（周恩來語）。正是這個「乒乓外交」，撬開了中美關係「緊閉之門」。十年過後，鄧小平又發動對蘇「葬禮外交」，意在改善繃得過緊的中蘇關係。這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舉動，它標誌着中蘇關係從對立、對抗到對話、合作的轉折。這是中國外交，乃至整個改革開放大業的一項重要內容，它對內對外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。

（下）

一聲「叫板」和五條「紀律」

朱大路

自由談

很喜歡陝西人李建軍的那本《小說的紀律》，我是冒着雨，跑了許多路，才買到的。

向來以爲，小說家比雜文家安全，胸中浩然，筆底蒼茫，都轉個彎，假託人物，來說事兒。所以我寫雜文寫得悶氣時，便去寫小說。如今李建軍公布了小說寫作的多條「紀律」，歸攏起來，主要是：「既不故意『懸置』作家的主觀態度，也不放棄他應該承擔的責任；既不恣睢地奴役人物，也不墮入低級趣味的爛泥塘。」看起來，小說這碗飯，老夫我是難吃了。難吃歸難吃，寫還是要寫，下筆唯謹愼吧，免得干犯「紀律」。

李建軍是老實人，承認書名是照着梁實秋《文學的紀律》起的。那麼，《文學的紀律》又是照着什麼起的？不得而知。其實，「紀律」好似空氣，是到處都存在的。譬如寫一篇「自由談」專欄文章，向某些觀點「叫板」，並不像在原野上跳舞那麼灑脫，任性，是要服從「紀律」制約的。最近讀到的李昌平向吳敬璉商榷的文章——《土地私有化不是靈丹妙藥》，便如此。

依我歸納，其中第一條「紀律」，叫做「爲了眞理，敢於向尊者、賢者叫板。」李昌平說：「我曾經在《中國改革》雜誌社工作過，吳敬璉老師是《中國改革》的榮譽總編輯。」「吳敬璉老師經常被媒體稱爲『國師』。」「但我覺得吳老師舉例說明的深化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主張，存在嚴重偏頗」。

第二條「紀律」，叫做「遇到棘手問題、敏感問題，不能羞答答、繞着行，而要敢於直面現實。」吳敬璉認爲，當前「土地產權問題沒有解決，農民的土地、宅基地等資產無法變成可以流動的資本」，因此必須「實現尚未完成的產權制度改革」。而李昌平點穿他——這其實是「要將土地私有化進行到底」，因爲吳敬璉「特別智慧，不直接說，這樣做可能是爲了避免爭論」。

第三條「紀律」，叫做「重視實驗，從實踐中取證。」李昌平認爲，農民的土地、宅基地無法變成流動資本，關鍵不是土地沒有私有化，而是沒有建立起與之相適應的金融制度及其配套制度，並給吳敬璉講故事，介紹自己在河南信陽郝堂村建立「農民資金互助社」的「試驗」，指明吳敬璉「缺乏實踐經驗」，「暴露」了「知識體系中的短板」。

第四條「紀律」，叫做「探討問題，屁股要坐在底層大衆一邊，不要坐在小衆一邊。」李昌平問吳敬璉：「土地私有化後，資本會迅速擴張，『公司加農戶』會突飛猛進，可這對小農是利好嗎？如果沒有農民的社區互助合作金融和合作社的先行，土地私有化對資本實現收益最大化是有利的，但對小農是很不利的。」「吳老師的主張不是爲了小農，而是爲資本下鄉獲得最大化收益開道了。」

第五條「紀律」，叫做「凡事要極目前瞻，考慮中國現代化過程的長期性、曲折性。」李昌平說：「十年左右會來一次經濟危機」，屆時，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返回家園，「要是土地私有化、資本化了，農業公司化了，吳老師有何良策應對經濟危機呢？我們能夠學菲律賓把中青年女性全部輸出到海外就業嗎？」

有沒有第六條「紀律」？大家去讀李昌平原文，找找看。

我不想就此對李昌平的「叫板」唱頌歌，彷彿土地問題在其手裡已經繪就了一幅美麗的藍圖，畢竟中國目前的改革，是商鞅、王安石等重量級改革家連想都想不到的曠世偉業，艱巨，繁複，非同一般。但我對其能在一聲「叫板」裡，嚴守五條「紀律」，心懷敬意。土地所有制改革，能離開這幾條？吳敬璉有反「叫板」的自由，甚至高喊一聲「土地私有化就是靈丹妙藥」，也是他的權利。但他眞要駁倒對方，同樣得服從上述「紀律」的制約。制約，是讓事情走向規範。我一想到，別的經濟學家，說話，著文，有時也被人「叫板」，說是屁股沒坐對啦，與有關「集團」掛上「利益鏈」啦，便覺得，商榷者並非「吃飽了撐的」，實在也是瞅見某些專家的思路漸漸地，漸漸地，跑偏了。

農村土地所有制問題，有點像改革的「瓶頸」了。衝出「瓶頸」，需要探索。探索的結論允許翻新，可探索的「紀律」不容顚覆；就像打籃球，比分會改寫，比賽規則不可改。

望之如雲 近之如春

孫曉林

如是我見

范（用）老駕鶴西歸。葉芳告訴我這個既在意料之中又令人震驚的消息時，腦子裡閃現出來的是這樣幾個字：爲書籍的一生！今後，范老的名字連同這六個字會永遠鐫刻在我的心上。

范老非常獨特。在三聯，他享有至高的威望。他的率眞、他的風趣和童心，每個和他接觸過的人都能強烈地感受到；而他高超的出版智慧、他的勇於擔當和堅定執著，又令每位員工對他充滿敬意。結識這位老人家，從他身上領略生命的高尚趣味，汲取人生的豐富營養，套句俗話，三生有幸。

我雖然一天也沒有在他手下工作過，但他的氣場太強了。很多後來進三聯工作的同人，和我一樣都從不同的途徑、直接間接地受教於他。范老有一張照片——身着一襲藍色長布衫，佩一條灰色圍巾，雙手握在腹前，昂首站立。旁邊有他親筆題寫的幾個字：還我舊時裝，范用。照片是在九六年前後拍的，出於三聯同事唐思東之手。不用說，老人家很喜歡。我也很喜歡，把它壓在辦公桌的玻璃板下面，十幾年了。

三聯搬到美術館東街二十二號，范老常來。每次肩上挎一個蠟染的藍花布袋，拄着枴杖，快步地在總編室、編輯部、出版部之間走進走出，時或從背袋裡取出帶來的寫有收件人的舊信封，裡面多是短札書翰，間或附有一兩本書，甚至一摞書，分頭交到各人手上。大家見到他，總會親熱地喊一聲，范伯伯，隨後各自忙去。他也從不麻煩任何人，該送的書信送了，該取的也取了，隨意在哪裡小坐一下就不見了。最怕的是范老來找他的書，他會直奔你而來，問得你發懵，上次什麼什麼書，是不是給你了？有一兩次，他在布告欄上張貼「露布」，尋找心愛的書，所有人都知道，那眞是天大的事。

范老的書翰絕大多數是推薦書稿、推薦作者，但有一點，向來都是他老人家的主動介紹和自己的建議，多數來源於每天大量閱讀書報雜誌時看到想到的，或者是新老作者朋友的作品，海內外都有，而從無他人請託之類的事情。印象最深的是他提議出版鄭超麟文集。九七年八月十八日范老來信，提議將鄭超麟《論陳獨秀》列入「讀書文叢」來出，「鄭老今年九十七歲，我在竭盡全力為他的幾本稿子謀求出版。這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革命老人，一生為革命，吃盡苦頭而志不改。」後來，當得知他推薦的這幾部書稿選題討論未獲通過，他來信重重地批評了一句，三聯沒有勇氣。隨後，在《文匯報》「筆會」撰文，他又隱去姓名地「公開」推薦，「一個早期黨的歷史的見證人，晚年寫了幾十萬字，十分珍貴，稿子在我手裡，彷彿捏着一塊紅炭。」次年三月，范老來信說，「現在有熱心人士來接生了」，「我十分感動」。這就是最終由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的三卷本鄭老文集《史事與回憶——鄭超麟晚年文選》。不僅於此，鄭老文集編選全過程都是范老自己一手操辦的，從初讀、撰文、編排到看清樣，最後出菲林寄香港。數十萬言，全稿他讀了三遍。這年，范老已經是七十五歲的老人了。

類似的重量級推薦還有王觀泉的《被綁的普羅米修斯：陳獨秀傳》。當時連同台灣版此書一起交給社裡作爲選題參考的還有「陳獨秀研究會通訊」等資料，顯然，范老不僅長年關注陳獨秀問題的動態，並且一直在細心地搜集研究資料，爲其出版文集、傳記而積極做着切實的準備。書未能出版，但老人家用他的身體力行教育了我們——怎樣做有理想（或者是有夢想？）的編輯，編什麼樣的書……

當然，經范老推薦的書稿更多的是已經面世並深受讀者歡迎的讀物。僅就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紀初那幾年來說，譬如董竹君的《我的一個世紀》、李一氓的《存在集續編》、黃苗子的《藝林一枝》、葛康俞的《據幾曾看》、鍾芳玲的《書店風景》、丘彥明的《浮生悠悠》，等等，都是他「扶持」出來的。

餘輝

（攝影）朱文杰

文化什錦

數字人生

梅桑榆

人一來到這個世界上，就與數字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了。人出生的那天叫「生日」，生日是靠一組數字記錄的。後來，人在辦理各種證件、填寫各種表格時，大多免不了要鄭重其事地添寫這組數字。人的年齡也是用數字來表明的，每過一年，我們的年齡就要改寫一次，直到隆重地或無聲無息地死去。而死去那一天，也是要用數字記錄的。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存在了多少年，當然也要靠數字來表明：生於某年某月某日，卒於某年某月某日。像這樣一組由不同的數字組成的最簡化的人生，我們常常可以在訃告、生平簡介或墓碑上看到。

人來到這個世界之後，不僅與數字緊密地聯繫在一起，而且生活在一堆數字之中。賈平凹曾用一串數字介紹自己：「賈平凹，男，陝西省丹鳳縣棣花鄉人，生於一九五二年農曆二月二十一日，屬龍相，身高一點六五米，體重六十二公斤，一九七五年畢業於西北大學，分配於陝西人民出版社任文學編輯，一九八〇年至今在西安市文聯供職。單位郵政編碼七一〇〇六九，地址蓮湖巷二號，電話（〇二九）七二七四九五九，家居西北大學六—三—四〇七，郵政編碼七一〇〇〇三，電話（〇二九）八三〇二三二八，在住宿樓我是四〇七，住院護士發藥我是三四八，在單位我是〇〇一，電話局催交電話費時我是八三〇二三二八，去機場安檢處我是六一〇一〇三五三〇二二一一二一，猶如商店裡出售的那些飲料，包裝盒上就寫滿了種種成分的數字。」老賈這番自我介紹，適用於任何人。無論是偉人還是凡人，無論是名人還是默默無聞的人，如果離開了這樣一堆數字，就會成爲一個身份不明的虛無縹緲的人，一個誰也無法找到的人。即使知道他在某個城市，也如賈島《尋隱者不遇》一詩所言：「只在此山中，雲深不知處。」表明一個人生命的長短和歷程，以及身份、住址、社會關係等等要靠數字，表明一個人在某一方面的才能和所取得的成就也離不開數字。說到一個從事科學研究的人，我們少不了要介紹到他有多少項發明創造，這多少發明是用數字來顯示的；說到一個從事文學創作的人，我們少不了要介紹他出了多少書，寫了多少萬字，這多少書、多少字是用數字來顯示的；說到一個經商或辦企業的人，我們少不了要提到他所擁有的資產，這資產也是用數字來顯示的……這些數字與那些表明人年齡、住址的數字不同，前者是與生俱來或附帶得之，勿需花什麼精力，後者卻要靠調動自己的全部智慧、付出巨大的精力而獲得。

數字既然可以用來表明人的才能與成就，當然也可以用來表明人的罪行與惡果，一個出賣國家利益的人給國家造成多少損失，一個走私或販毒的人私運了多少貨物或販賣了多少毒品，一個搶劫或盜竊的人作案多少起、搶竊了多少財物，一個貪官貪污了多少錢、收受了多少賄賂……均是用數字來顯示的。當然，他們受到法律制裁，服刑多少年，也是用數字來表明。從與這些人聯繫在一起的簡單的數字，可以看出其人的罪行大小，及其惡劣的本性，而這些以數字組成的犯罪紀錄，將與這些人的一生緊密地聯繫在一起，即使他們的生命終結之後，仍在向世人昭示着他們的罪行。

文化經緯

天眞的眼睛

言止善

隨着年歲的增長，被人批評「別太天眞」的次數越來越多。莫非天眞是個貶義詞？世上若沒有天眞，大家的日子是不是更好過？和米米相處了一段，我自認爲有了一個明晰的答案。米米是個小朋友，前年出生。那是鼠年，因爲老鼠裡有個人見人愛的米奇，米米的名字便與此有關。不到兩歲的米米，會走會跑，愛和外婆玩「抓米米」的遊戲。她能講三五個字的句子，叫「餅乾」、「西瓜」等時意思都是清楚的。夜晚入睡前必嚷嚷：「泡美涅涅。」美涅涅指她愛吃的奶粉，這和奶粉牌子毫無關係，它是米米發明的「新詞」，只有幾個人懂。

米米最早學會造句是用「謝謝」。鄰居郭奶奶做了一條韓式的小裙子送給米米，米米穿着它照鏡子，左照右照，還不忘禮貌地說一聲：「謝謝郭奶奶。」上街路過點心店，米米大叫「麵包」，外婆連忙買回。媽媽講：「米米，謝謝呀。」米米面向店主：「謝謝阿姨。」媽媽講：「還要謝謝。」米米說：「謝謝麵包。」米米是穿紙尿褲長大的，「方便」前常忘記發出訊號，和她的媽媽同齡時比較，屬後知後覺。她媽媽不以爲然，堅信專家提倡的理念——小孩子進食和方便都不可強加外力，要珍惜這一段人生中難得再有的放任時光。圍着米米轉，爸爸不如媽媽。米米能體諒爸爸工作忙，爸爸回家時，總是撲向她的「愛爸爸」。父女情深，可以見之於她爸爸的一篇題爲《女兒的笑》的博客：「女兒三個月大了，我第一次寫女兒。女兒比較酷，嗓門很大，餓了會大哭，左鄰右舍都知道她的厲害。她一般不笑，有時老婆要用持續幾分鐘的大笑才能引她笑上幾秒。只有當她吃飽喝足躺在床上注視頭上的兩串我買給她的絹花時，特別是花在擺動時，她會發出笑聲來。她笑得簡單、燦爛、純潔，如高原上一塵不染的雪蓮花。」「女兒很純眞，她會對着爺爺奶奶笑，因為前一段她白天睡覺夜晚鬧，是爺爺奶奶忘掉疲憊徹夜呵護她；她會對着媽媽笑，媽媽每天陪伴她，給她餵奶，給她唱歌。我很少抱她、哄她、逗她，在她晚上不睡覺的時候還很煩她，我誠實地把這些寫在臉上，她也誠實地把感受寫在臉上。」「昨天，我抱着女兒，她睏了，倚着我的胸慢慢地進入夢鄉。忽然聽到她咯咯的笑聲，她是在夢裡笑，笑得很甜。我想，她一定是看到頭頂上那兩串花在空中擺動……」

米米已長到八十五公分高了，兩年之中，沒有變化的就是那一對清澈透明無憂無慮的大眼睛。我看電視，每當見到那在孩子面前吵死吵活鬧離婚的夫婦，還有那遠離父母的「留守兒童」，都會自然地想到米米。本來，孩子經常得到父母的撫愛，是情理中的事，但現實裡卻常常缺失。換句話講，能和爸爸媽媽慈愛而熱切的目光相遇，對不少孩子而言，竟成了一種奢求。和諧社會是個什麼樣子？在我看來，最不能少的是孩子都該有一對蕩漾着天眞的眼睛。

往事鉤沉

納涼

徐城北

粉碎「四人幫」的第二年，文化部把我從河北農村小縣直接調進中國京劇院當編劇。家住後海西岸的一個兩居室中，我成爲北京一名獨立的文化人了。自問什麼感受？焦躁，急切，希望早些在工作上出成績，否則對不起調我回來的文化部，對不起直接、間接關心着我的前輩。放眼什剎海，我住的位置眞不錯，騎自行車，到哪裡也不遠。馮亦代住同一個大院，每到傍晚，他就拖着病腿在樓下散步。黃宗江等一大批文化人都住附近，同時他們也是我父母的朋友。我陸續拜訪了這些老文化人，發現大家住得並不好，一方面爭取搬家到新建的樓房，但在沒搬家之前，還是有條不紊做着自己的工作。黃宗江是最有活力的一位。名義上他是八一電影製片廠的編劇，可平時忙於給《人民日報》等大報寫劇評文章。往往是北京頭一天晚上才有演出，第二天中午報社就到他家取稿，通常第三天就能見報。他文章寫到的那個戲，通常是五湖四海來的，就藝術形式講，也是百異千奇，不拘一格，黃怎麼能僅僅看過一遍，就能迅速寫成那如詩如畫的華章？有點神了。等後來與他熟了，他才告訴我看戲之前通常要預先打腹稿，要使出吃奶的勁兒。傳說他騎車回家總是喊：「娘子，開門來！」他夫人是中央戲劇學院的副院長，在門裡回答說：「京劇才是你娘子，讓她給你開門吧！」黃試推門，發現是虛掩着的，偷笑，回到卧室，無言睡下。次日凌晨，三點就披衣起床，在桌前鋪開稿紙，就把昨晚想得差不多的稿子一揮而就……

難得有機會聽黃宗江評述自己，那要等他自己高興——黃會把近期文章攤開來，告訴聽者哪篇用了加法，而哪篇是用了減法，他曾神秘地告訴我，「加法容易而減法難呦……」，記得那個「呦」字是用南方口音吟唱出來的。

與文人爲伍不易，與前輩文人爲伍尤其不易，但要想有所體會，不主動些還眞不成。我要求自己每天都落筆，不落筆時亦要用心。我曾比較過馮亦代與黃宗江的異同：假如黃執筆，會從哪兒起哪兒落；如果馮寫，重心與文風則必然有重大變化……爲了摸清這些小節，就需要認眞讀前輩的文集，要用心揣摩他們的遣詞造句。今天你能身在其中是你的幸事，明天離開了這個群兒，想學也學不到了。也巧，我那時這樣機會甚多。時常有廣州文化記者來北京組稿，他們早上乘飛機出發，中午抵達北京。下午打電話通知各路諸侯：次晨九點在北京的大三元吃早茶。大三元在北海、景山、故宮的交叉點上，誰來都方便。結果次晨人滿爲患：吳祖光、黃宗江、王蒙、丁聰、方成、北京各路的雜文家們，最後再加上個我。見面大家寒暄，才知道女主人已入住在北京的五星級酒店，但就昨天一晚，她已訂好午後的回程機票。開門見山，此後是神聊，早茶帶午飯，吃到十一點半散會，大家各回各家，女主人回酒店取行李直奔機場……

什剎海是大景區，大景區中套着許多小景區，最重要的景區則是人，是人心中那種亂中取靜的本領。我從諸多老先生身上學到這一點，很快適應環境，入鄉隨俗，就從文章入手，由戲寫及人生，由火熱的盛夏寫到清爽的晚秋。我積極搞起了研究。文化部領導看到後也說，「徐城北願意寫文章，你們國家劇院確實也需要這麼個人，就讓他幹自己願意做的事情吧。」等我頭上沒有編劇的擔子壓着了，後來反倒爲程派名家李世濟寫了齣京戲，演出後反倒獲得文化部的大獎。回想起來，當初一回北京，如果風急火忙地直奔劇本創作，最後反倒不是今日從容之我了。

俗話說「心靜自然涼」，取得良好心境看來是第一位重要的。今人生活的節奏必然繁忙，但總應當力求平靜，要懂得與善於納涼。